

◇对话

魂牵梦绕黄土情

——与刘瑞祥先生的对话

□ 李怡萍

刘瑞祥，出生于1945年7月，汾阳市人。我市首批命名的“吕梁人民作家”，也是首批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2019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他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汾州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

李怡萍：您的名字一直与汾州故事、汾州文学连在一起，能说说这么多年来，汾州地域文化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瑞祥：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滋养非常重要，一个是故乡，一个是童年生活。汾阳是我的故乡，是黄河流域人类早期活动的地方，于春秋时期置县，历朝历代曾设州、郡、道、府等治署，乃三晋大地上名望很高的重镇之一。千百年来，汾阳人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汾州文化。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量十分巨大，小时候，我经常去听由许多盲艺人说唱表演的“打瞎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文化馆工作后，在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听了几位民间艺人演唱的汾阳场秧歌段子《刘二傻卖甜瓜》后，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民间文学是人文文学的老祖宗，为了将这一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多年来，我利用文学创作和行政工作的间隙时间，后又用六年的时间，集中全部精力，走遍了汾阳的每一处土地，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传播者，收集整理了民间传说二百余篇、民间故事二百余篇、民间说唱一百余篇、汇集总字数二百余万字的版本。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汾阳乡土气息，闪烁着鲜明的地方色彩，焕发着汾阳人的人性光辉。

我的文学作品大都产生于故乡的黄土地上，许多篇什都萦绕着汾州文化的意蕴。我步入古稀之年时，我所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山西首屈“赵树理文学奖”得主武毓璋老师，赠我五言律诗一首，很贴切地概括了我的创作生涯。全诗内容为“植根黄土地，磨砺乐耕耘。汩汩泉峰注，欣欣百卉荣。诗思灵且敏，健笔老犹雄。赤子情怀在，晚霞分外红。”

李怡萍：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叙事诗？

刘瑞祥：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叙事诗历来很受读者青睐，它以萦绕着诗意的故事情节、人物动态、诗人咏叹，以及心理描写、氛围营造、生活气息、象征意味等特点，具有诱人的雅俗共赏性，浓烈的可读性，生活层面的真实性。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事件为主线，人物为核心，环境为背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小说的特征，但它读起来更凝练、简洁、跳跃、律动、释怀，因此，我认为诗化的故事更动人，诗化的人物更有趣，诗化的语言更耐读。

我在《诗刊》《星星》《山西文学》等刊物与书籍中，发表了四十多篇叙事诗，有读者来信称我是叙事诗人，我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李怡萍：民歌民谣产生于民间，许多作品是无名作者，由于源于最底层的生活，所以比文人诗歌更具广泛的感染力，请您谈谈民歌民谣的创作？

刘瑞祥：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民歌民谣产生特殊的感情和偏爱。我爱它们的清新、明快、质朴、率真，爱它们的辛辣、恣意、诙谐、洒脱，还爱它们的乡土气息、百姓气息、生活气息。多年来，我从民歌民谣中，汲取了极为可贵的养分，并融化到新诗创作中，得益匪浅。民歌民谣的创作，看似容易实不易，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这种文体，并运用得手，需具有较为深厚的生活功底与文学功力。民歌民谣姓民，作者的平民意识，作品的可读性，决定这种大众文学、草根文学，能否与广大利民百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而共鸣是最好的文学效应。我相信，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民歌民谣传播，歌谣永远是黎民百姓的忠实朋友。

李怡萍：传统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之根，随着岁月的流逝，一部分民间艺术将面临失传的危机。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汾州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您觉得如何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学，才能使其走得更久更远？

刘瑞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的目光开始瞄向家乡的民间文学。如同山西的煤炭

一样，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十分丰富，这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若不及时系统的搜集整理抢救，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势必会随着老人们的不断离世而“入土为安”，或是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风化在时代的烟云里。道义在肩，刻不容缓，从2004年后，我暂停其它工作，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家乡的民间文学采写中去。我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民间艺人，整理出240余万字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

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须追本溯源，钩沉探微，进行全方位顺乎情理的完善和还原。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创新、大胆改进，创作改写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味，可以诲人、劝世、扬善的作品，并用新媒体的方式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播，这样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李怡萍：您曾出版过一册《深深的古井》小说集，在您的文集中，小说比重占有量不算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小说创作的？笔下的小说与诗歌或者民间文学有关联吗？

刘瑞祥：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各种艺术门类以其独特的景致，构成了各自的玄妙境界。我思谋小说也是由来已久，身居汾阳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民间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小说素材，因而陆续写了一些小小说、短篇、中篇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郭亦民先生曾对我的一组小小说写过评论，他说：“刘瑞祥的这组小说，使我不仅首先惊奇于他原本属于诗人之列而非小说家之伍，却又对小说之技巧章法运用得如此娴熟与老到，而且更激动于其作品中那字里行间所涌动着的作者作为诗人的那种艺术之灵性。”他的这些话，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了我艺术心灵的悠远之境。

李怡萍：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纪实文学，您都着力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独特形象。文学创作，除了生活经验，还有什么？

刘瑞祥：“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的一切活动均源于“生活世界”。生活即日子，也就是衣食住行、七情六欲、礼仪廉耻、家国情怀、建功立业等内涵。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热爱生活、敬畏生活、体味生活、享受生活。我始终认为，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很微小脆弱的，但是，恰恰是这些人，见证了历史，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那些秧歌的咏叹、歌谣小调等所有的民间文化，都在传达着人类大爱大恨、大悲大喜的情思，传达着乡间风情，构成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生活处处即文学。但文学不能照搬生活，文学要想实现对人生的真正反映，必须实现对历史、社会和时代的超越。而要实现这些，必须要有惊人的洞察能力和想象能力，还要能打动人心。

李怡萍：汾阳是个好地方，一个好字，概括和包含了从古至今凡事颇为讲究、颇为聪颖、颇为内秀的汾阳人民的汗水、智慧和创造能力，请您谈谈汾州文化的魅力。

刘瑞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汾阳宝地上，不仅酿造出了汾酒、竹叶青酒，还植出了享誉海外的汾州核桃和美食文化，诞生了诸多优秀人物，还创造了许多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在中华大地上，以其鲜明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汾州文化。文化，是讲究、是积淀、是特色、是陶冶、是享受。我便是以汾州这块土地为母题，面对山川河流、城镇乡村、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沧桑世事、地方特产、家族人物等一切意象，写出我的所思所想，展现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李怡萍：能谈谈您的创作历程吗？

刘瑞祥：1965年，我参军后，在部队写的一些诗歌在《解放军文艺》、《连队文艺》等报刊发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诗刊》先后发表了《光荣的吕梁山》《打狗棍新传》和《瓜田春秋》等诗。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出版了《收获季节》《山祭》《深深的古井》《黄土风情》《黄塬季风》等诗集，与人合写合编了多部著作，1988年，抒情长诗《我在杏花村、酿酒》获《人民文学》首届“茅台奖”。2000年后，先后出版了我的民间文学集六卷本、我的文集16卷本。从1965年发表作品至今，共撰写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民间文学、报告文学、文史研究作品共约700余万字。我的创作实践证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到广阔的生活中寻找素材，感知题材，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作品，让读者点头的作品。

李怡萍：文学创作是个性的劳动，而作品却是社会化的读物。结合您几十年的创作经验，谈谈“文以载道”的含义。

刘瑞祥：古人云“文以载道”，道是什么？我觉得除了道德含义外，还包括有正义性、真理性、自然性、先进性、人民性等诸多能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以及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精神动力，唯有载道，才能厚重，唯有载道，才能致远。

李怡萍：作为一名作家，您觉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今后，年轻作者的笔触该指向哪里？

刘瑞祥：文学的功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找出五彩斑斓生活背后的真相，文学描写的高与低，不在华丽的句子和优雅的抒情，真知与灼见才是文学的根本。在《汾州沧桑》（4卷本，每卷一百万字，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记中，我曾写道：“艺术注定只能与真诚、勤奋、悟性为友，而与浮躁、虚荣、轻狂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搞艺术的人，应该能溶于氩氙之气中的片片茶叶，甘于淡泊，甘于释怀，把一种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独特享受馈赠人间，这大概便是属于地道文人的一种怡然品格吧。”

年轻作者如果想在文学这块圣地上耕耘下去，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处境，清除内心的浮躁，静下心来思索社会思索人生，千万不要被浮躁的社会心态俘虏了你的心。文学作者是社会使命的负重者，而不是局外人，更不是无聊的玩弄文字的人。

◇人物

这样的画面经常在我眼前掠过：一个六岁的男孩，与其年轻的母亲，抬着一桶水，从离家一里地的水井边往回走。男孩走得慢，母亲弯着身，也走得慢。走一步，水桶摇晃一下。母亲把水桶一遍遍往自己身边拽。一次，男孩脚没站稳，一个趔趄，桶斜了，水洒了一地。不久之后，男孩的父亲去世，从那一刻开始，他长大了。而且，以后的人生路程中，无论崎岖坎坷还是一帆风顺，都靠自己面对。这个男孩子，就是童年时的刘瑞祥。

刘瑞祥生在汾阳长在汾阳，小时候与家人租住在汾阳城黑楼底街的院落里。房东黄爷爷经常给他讲汾阳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上小学前，已识得五六百个字。一天也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努力将自己认下的字，用毛笔一个一个写在方块硬纸上，再一个一个教他认，就是这些文字，成为他后来走向文学殿堂最初的铺路石。父亲觉得，家里辈辈都是受苦人，几代人没有一个能提笔写副春联的文化人，父亲非常希望他能给刘家改换门庭。

他的外祖家在县城的西关，关里有一座叫三皇楼的古建筑。每年元宵节，这里便聚集了全县范围内的许多盲艺人进行说唱表演，三皇楼的台阶上人流不绝，甚是热闹，大人们说这叫“打瞎会”。这是他最早接触民间说唱文学。

长大参军后，刘瑞祥有意识、有追求地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由于有写诗、篆刻、画画的特长，被调到西安部队。在部队图书馆，他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特别是诗歌，开阔了眼界，明白了诗歌是什么样子，为以后写诗奠

来，必须向民间学习，向老艺人学习。他是一个观察者、思索者、记录者，他痴迷于描写汾州大地的人与事，不间断地采访，不间断地写作，真诚地书写着每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字里行间显示出对远方水土这方人深深的热爱。一个真诚的作家，只有在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认真地深入生活，扎实地写作，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殿堂，不然，只会成为空中楼阁式的样子，渺茫虚幻。几十年专注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元素，已融入他的血液当中，鼓舞着他一路前行。

纵观先生的作品，文风质朴，叙述真实，一切都是娓娓道来。搜集采访中，他感觉到，传统的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有的只能提供一些故事梗概，有的还含有一些庸俗的杂质，因而他力求在现实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经过想像，来更好地顺乎情理地还原和叙述，使得作品文学性更强，故事更深入人心。可以看出，在整理撰写中，他非常注重叙事语言的风格、人物心理状态的窥探和故事的文化氛围，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成为一个滔滔不绝的讲述者。在讲故事的同时，还融入了许多汾州民俗风物等值得体味的民间艺术与文化，让读者重新认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文学创作除了丰富自己的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启迪人心。刘先生始终有一颗真诚虔诚的初心，迷恋钻研民间艺术，以或生动、或严肃、或讽刺、或诲人的笔墨，让作品与广大黎民百姓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刘先生有深厚的家乡情怀，他的写作立足古汾州，意境却是中华文化的，是黄河流域“三晋文化”的，其文学品味与文化价值显而易见。期待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提升汾州文化品格有持久的影响。

刘先生有深厚的家乡情怀，他的写作立足古汾州，意境却是中华文化的，是黄河流域“三晋文化”的，其文学品味与文化价值显而易见。期待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提升汾州文化品格有持久的影响。

吕梁山作家
本栏目由吕梁市作家协会协办

走近刘瑞祥

□ 李怡萍

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诗相继在《解放军文艺》《陕西日报》《诗刊》发表后，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诗友的问候信，时任《诗刊》社主编王燕生先生，也写信告诉他诗社得到的反馈情况。直至文学创作有一定的积累后，他才懂得，兴趣往往出于爱好，而爱好可以产生无穷的动力，甚至转化为事业，从而一辈子进行到底。

刘瑞祥聊文学，聊他当年骑着自行车走遍汾阳的各个村庄，采访民间艺人，书写民间文学。他说，文学创作是个特殊行当，要有文学细胞，还要能吃苦，有见地。他始终认为，扎根于生活，是文学的生存价值所在，彰显真善美，是文学的生命价值所在。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心认真思考过，才有了半个世纪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此前，我曾系统拜读过先生的16卷文集，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民间文学，都立足于汾州这块土地，立足于关注人民命运和社会的真实图景，观照、反思，处处呈现出世道人心。

刘瑞祥聊生活，他永远忘不了父亲去世时的情景。天塌似的恐惧如黑云般压下来。父亲人殁时，用的是家里一支立柜改做的薄棺。出殡时，他披麻戴孝手拄哭棍。临出门时，摔碗的情景到现在仍历历在目，让人唏嘘不已。生活的苦难，锻炼了他的童心，坚韧了他的性格，使 he 可以从容地面对后来的岁月。

刘瑞祥的伯父是他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在他心中，伯父是天，伯父是地，伯父是他一辈子无法忘记的疼。他的伯父是个单身汉，孤独了一生，困苦了一生，劳作了一生、坚韧了一生。但他对侄子视如

己出。懂事的孩子要帮伯父干活时，伯父断然拒绝，怕小小年纪被“撇着”（汾阳话伤了内脏）。伯父经常三毛五毛地给他零花钱。上学时，全部的书费学费都超额给他。伯父一直生活在一种很有信心的希望中，期盼侄子作为刘家的传承人，能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改变刘家没文化的门庭。伯父年老病重后，他拉着坐在小平车上的伯父去汾阳医院就诊。当医院让他准备后事时，他拉着平车走出医院，一边走，一边流泪。走在汾阳县城他和伯父无数次走过的大街时，心情沉重，步履沉重，他上衣的前襟完全被泪水打湿了。几天后，伯父去世。老人一生的气味，甘的甜的，苦的湿的，化作了刘瑞祥笔下的一篇文章，字字情深。

刘瑞祥是一名专业作家，却喜欢篆刻，喜欢乒乓球运动。他的篆刻，是因为伯父的手章丢失后，他自告奋勇要帮伯父刻一个。他讲起小时候，站在县城太和桥刻章摊上，看人家刻章，而且一看就很入迷。他细心地看人家用小楷毛笔在纸上写名字，往印章上翻页，用舌头尖上的唾沫把翻印纸舔湿，用大拇指挤压，最后下刀去刻。那次，他用自己的斜口刀和写仿用的小楷毛笔，临柳公权的楷书，以及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完成了为伯父刻的第一枚印章作品。其后不可收拾，陆续为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刻过不少印章。篆刻如文学一样，都是一种修养，一冲一切，一朱一白，便有了小家碧玉的细腻，或者苍劲有力的道行，方寸之间大天地。

刘瑞祥从十三岁开始打乒乓球，先后在县市省级获得各种奖项，同文

◇作品赏析

吃 请（民间故事）

□ 刘瑞祥

古时，乡村中的编户实行的是里甲制，里的头儿叫里正，甲的头儿叫甲长。明朝时，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十户为一甲，但那时的大户都是几代人在一起，一户四世同堂的人家，合起来不下三二十号人，总起来也是三二百号人的主事人哩。

汾阳东南乡的泉泽洲里，有个甲长外号叫“饽嘴”，村中的甲份里不管谁家办请客设宴的事，都不能少了他，而且是不上礼金，还要坐上席，还要等人来请，若有怠慢，便伺机报复，叫你没好果子吃。

要说饽嘴甲长家资富裕，可他生性是个吝啬鬼，凡事遵循刻薄成家的祖训，因此人们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但碍于他是一甲之长，遇上事还得违心地给他个大面子。

这天上午，饽嘴甲长接到一家送来的请柬，人家出于礼貌，请柬装在一个开口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受请人的尊称以及恭请人的名字。

饽嘴甲长正坐在八仙桌旁抽旱烟，接过信封后熟练地把请柬往出一抽，不看事由，直接去看吃请的日子。本来，这家办事的日子是下月初三，可饽嘴甲长懒得把请柬全部抽出来看，因为他并不关心人家是办什么事，是娶妻嫁娘，还是老人过寿？他只关心何日起宴。这天请柬他抽到“三”字的头一画时便停住了，以为是初一的日子。

他寻思，今天已是三十了，明日便是初一，怎么这家的请帖到牛角梢头的日子了才送？哼！他心中甚为不悦。按他的惯例，每逢吃请，头一天就不吃自家的饭了，美其名曰“腾肚子”，也就是让肚子里的积食都消化尽，为次日多吃人家的饭菜做好准备。他还有个习惯，吃请后的第二天也不吃家里的饭，因为头天吃足了，这叫两头省。

第二天快到午饭时，他摆起架子端坐在家中，等人家来请，但等来等去不见有人登门，顺手拿起丢在八仙桌上信封，又把请柬抽出来看了一下，不由自言自语道：“咳，怪不得没人来请哩，是把日子看错了嘛，原来是初二才办事哩。”这次，他把请柬抽到“三”字的第二画时又停住了。饽嘴甲长思忖，我已经腾了大半天的肚子了，若是吃上自家的饭，岂不是白腾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腾倒上一天，明天可以多吃些，于是一整天都没吃饭。

初二这天，他不到饭时便惦记上了吃请的事。到了饭时，却左等右等不见有人来请，心中好生恼火，恼火中又生狐疑：敢是日子又不对？他又一次拿出信封，这回，干脆把请柬全部抽了出来。一看，果然不然，人家是初三嘛，你初二不是白等？

学一样，这项运动伴随了他半个世纪。小小的乒乓球给了他欢乐，给了他荣誉，给了他体魄。我很难把文质彬彬的“吕梁人民作家”“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与叱咤乒坛的业余高手想到一起。然而，确实是这样，他有学者的风度，有艺术家的气质，有体坛运动员的意志。无法割舍的痴情与热爱，让他把这三种爱好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刘瑞祥有一颗聪慧的心，有温和安详的心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他的勤奋、他的睿智、他的坚守让他成果丰硕。作为丈夫和儿子，他又是一位对家庭对社会有担当的人，这从他对战友、同事、家人的态度可以看出。说起与继父一家最多时十口人长达十余年的一个锅里搅稀粥，说起妻子对他生活的照顾，文学的支持时，他温情脉脉。

回顾刘瑞祥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他尝尽了少年愁的滋味，也品尝了中老年的丰收喜悦，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的本真，人间甘苦，冷暖自知。

刘瑞祥直到现在都不用手机，能联系到他的，是家里的座机。他说，使用手机太浪费时间了，好好的时间，不如用来读书、写作和刻印。在这个属于飞速度的时代，让一切慢下来，悠慢地读书写作，悠慢地生活，悠慢地走步锻炼。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态度，也是他生活的态度。

没办法，只好等明天了。这下饽嘴甲长作了难，今天的饭吃还是不吃？吃吧，已经是腾倒了两天的空肚子了，吃起来能少了？这不吃大了亏！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咬咬牙继续腾肚子，反正已经是空了两天了，也不差再空它一天。

这种腾肚子法，搁在一般人身上哪能受得了！好在饽嘴甲长有这个馊功，到时又有撑功，自然也就练出了这方面超人的本领。

初三这天，办事人家果然不到饭时就派人来请，饽嘴甲长大大方方地去了后，坐在人家的客房里，人家又给他点烟锅，又给他倒茶水，很是客气热情。已经饿了整整三天的饽嘴甲长，肚皮早已是前心贴上了后背，再加上茶水一潮，肚子里咕咕地直叫唤，空式式地十分难受，而眼睛里黑蛾子乱飞，这种现象是饿极发昏的症状。

此时，饭时还未到，他饿得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就在上厕所小便的时候，偷得吃了主家供献在外院墙壁窟窿上土地堂内的三个馒头。这事，恰好被主家的小女孩子看见了，就告了她妈，女人又告诉了丈夫。

主家出去一看，土地堂内的馒头果然不见了，心里很不高兴，寻思：今天是好日子，是给俺老爹过七十大寿，堂堂一个甲长，竟然偷吃人家的供献馍，这算是什么事？得罪了神灵怎么办？

由于饽嘴甲长的名声不好，主家以往又和他有过不睦，心里有疙疙瘩瘩的小矛盾，便想借这个机会治一治他，给他出出洋相，丢丢人。

主家返回内院后，有意当着饽嘴甲长的面，对他老婆高声道：“土地堂里供献的三个馍馍一个也不见了，肯定是叫老鼠偷上走了。这倒好，就知道它们要来拖，这回吃上就美了，非闹死狗日的们不可，省得晚上钻到仰层顶闹打，像跑马似的，闹腾得人睡不好觉。”汾阳人把顶棚称为“仰层”。

饽嘴甲长一听，心里“咯噔”一沉，脱口问道：“馍馍怎能闹死老鼠哩，敢是放上砒性啦。”

“哩嘛，还放了不少哩。”主家显得挺得意。

啊！饽嘴甲长的头上立即冒出了虚汗，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因为他明白，砒性就是砒霜，是毒药，想寻死的人才吃这东西哩。这可怎么办？承认说馍馍是自己偷吃的？这算是丢尽人了，可要想得罪主家的帮助和救治，就得言声，不说，岂不是白白送死？丢人和丢命相比，当然还是命要紧，于是，饽嘴甲长哆哆嗦嗦地站出来说馍馍是他吃了，不是老鼠偷走了。

“啊呀，你看这事，你看这事……”主家一边假装着急，一边对家里帮忙的人说：“快快快，快去拿个苕芽羹汤的东西来，非这东西不能救，这又叫以毒攻毒，摆弄得吐了就有救了，把毒东西吐了就好了。”

说话间，饽嘴甲长被主家扶到厕所里，捏住鼻子硬灌了些臭烘烘的茅粪汤子，随即吐了个翻肠倒肚，翻江倒海……